

燕 赵 文 化 研 究 丛 书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研 究 系 列



文化视野中的 晚清燕赵小曲



胡小满 著



科学出版社

燕 赵 文 化 研 究 丛 书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研 究 系 列
河 北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研 究 项 目

文化视野中的晚清燕赵小曲

胡小满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统研究了燕赵传统民歌——小曲,运用文化区、文化景观及文化扩散理论,对晚清以来流传于燕赵地区的小曲进行了富有文化学意蕴的阐释。全书内容涉及燕赵小曲的多种音乐形态、文学维系与音乐维系下的名曲、精妙唱家为代表的歌者及唱技、区域历史文化浸润的成因、传承保护的文化重构思考等诸多方面。

本书适合音乐学、文化学研究者,群众文化工作者以及艺术院校师生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视野中的晚清燕赵小曲/胡小满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燕赵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03-032649-2

I. ①文… II. ①胡… III. ①民歌-地方音乐-研究-河北省 IV. ①J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1210 号

责任编辑:王贻社 谢远能 / 责任校对:宋玲玲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科地亚盟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佳艺恒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720×1000)

2011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9 1/2

字数: 340 000

定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燕赵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 王长华

副总主编 武吉庆 郑振峰 王宏斌

成 员 王长华 王宏斌 邢 铁 沈长云
谷更有 张怀通 张翠莲 武吉庆
郑振峰 倪世光 秦进才 徐建平
阎福玲 董丛林

总 序

为便于研究，我们这里所指称的燕赵区域总体包括现今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与燕山南北麓，不仅包括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而且也包括存在其间的古中山国、代国和邢国等地。燕赵区域内特定的地理和气候环境、连绵不断的战争、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导致了燕赵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燕赵文化的主体是华北平原的汉族旱地农耕文化，同时也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特征。

燕赵文化虽然与相邻的三晋、关中、中原、齐鲁各区域文化多有交叉和重叠，但它却更具北方文化的典型特征。就燕赵文化的气质特性而言，人们多认同它的慷慨悲歌和任气豪侠，这一特征虽非燕赵区域所独有，但无疑它在该地表现得更为典型，它形成和成熟于战国时期，其后绵延两千余年，成为燕赵区域悠久而稳定的文化传统。就燕赵文化的构成和发展机理而言，有学者认为，兼收并蓄而自成一家乃其重要特征。这既与燕赵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多元构成等因素息息相关，又与燕赵地区的先贤今哲洞烛社会发展先机，并以海纳百川的心胸和气魄，对各家各派思想成果择善而从、整合提炼关系至密。这样的看法对于我们认识和思考燕赵文化无疑颇多启示。不过，在尚未对燕赵文化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之前，我们还不能对其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妄加评说。

随着社会转型的日渐急迫和人们文化意识的增强，区域文化研究在全国各省区受到了比以往更为广泛的关注，如齐鲁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河洛文化、三晋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并且已经涌现出了一批颇具影响的研究成果。相比较而言，燕赵文化虽然底蕴深厚、特色鲜明，但已有的相关研究却远不能令人满意。就现状来看，致力于燕赵文化研究的学者虽不乏其人，有些成果的品位和水平也不谓不高，但从总体看，系统性尚待加强，学术性尤需提高，为数颇多的重要项目课题依然需要学养深厚的学者涉足参与。综合主客观两方面，我们认为目前制约燕

赵文化研究的因素大致有三：一是缺乏统一组织，二是资金投入不足，三是缺乏整体规划。

就组织状况来说，既往的一些相关研究机构，组织结构欠紧密，协调沟通乏力，以致此前的燕赵文化研究多属个人行为，基本处于分散状态。为此，河北师范大学整合全校研究力量，组织成立了“燕赵文化研究中心”，希望借此聚集校内外，乃至省内外有志于此的学人同道，本着既分工又合作的原则，协力完成这一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大型研究项目。

资金方面，由于以往相关课题的研究范围涉及相对狭窄，相关部门的经费支持力度不够，从而制约了系统而深入的重要研究成果的产出。这次河北师范大学拨出专项资金以支持此项研究，从而为研究经费的缺乏解了困。

为便于研究方案的顺利实施，河北师范大学燕赵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伊始，即对燕赵文化研究工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划。关于“文化”的定义，言人人殊。据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的统计，从1871年到1951年的80年时间里，有关文化的定义约有164种。可见，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要想在短时间内使其达成共识决非易事。本规划无意纠缠于文化概念的辨析，而是企图通过扎实有效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呈现燕赵文化的一鳞半爪。为此，我们大而化之地将燕赵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思想文化遗产三类。

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代遗址、古代墓葬、古代建筑、石窟寺庙、碑篆石刻等不可移动的文物。河北省的物质文化遗产相当丰富，对其进行抢救性研究和保护刻不容缓。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称谓）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等，举凡传统表演艺术和民俗活动等皆属此类。河北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十分令人瞩目，如皮影、年画、梆子、沧州武术、吴桥杂技、邯郸傩戏等，其社会文化价值不容低估。思想文化遗产方面，燕赵大地曾经孕育出众多文化名人，如政治家赵武灵王、赵匡胤、赵佗、魏徵、张之洞，思想家荀况、公孙龙、董仲舒、颜元、李塨、李大钊，军事家乐毅，文学家贾岛、崔护、高适、王实甫、关汉卿、纪晓岚、曹雪芹，科学家郭守敬、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医学家张

仲景，等等。深入研究他们的思想和行事，不仅有利于了解昔日历史文化的递嬗和变迁，而且对当今的社会和文化建设也将大有裨益。

依上述类别，我们组织各方研究力量编撰了这套由五个部分组成的“燕赵文化研究丛书”：“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着重研究泥河湾考古、历代长城、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清西陵等著名园陵、直隶总督府等政治机构设施、大佛寺等宗教设施和赵州桥等建筑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着重研究河北皮影、武强年画、蔚县剪纸、衡水内画、说唱大鼓书、河北梆子、吴桥杂技、民间泥玩等。“文化名人研究系列”着重研究燕赵历史文化名人之思想与学术。“古国研究系列”着重研究先秦时期存在于燕赵大地的诸侯各国，如赵国、中山国、燕国、邢国、代国等。“河北珍贵档案资料系列”系统整理河北省档案馆和分散在各地地方史志中的珍贵文献资料。

上述研究规划的顺利实施，不但需要整合省内相关部门的研究力量，而且也期待位于燕赵文化区域内的京津地区相关专家、学者的加盟。我们将凝聚各方力量，从2009年2月起，陆续推出近百种既相互关联、又自成体系的系列图书，以期与文化强省战略的实施、燕赵文化品牌的打造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贡献绵薄之力。

燕赵文化研究系列项目的承担者们以其严谨科学的态度，尊重学术规范，多方搜集和认真爬梳资料，对各个相关问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探讨。项目完成后，编委会聘请有关专家对之进行了认真的审读和验收。出版过程中，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为保证丛书质量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值此丛书出版之际，丛书编委会对于作者和编审者一并表示诚挚的谢忱。

限于作者、编者的时间、精力和学力，丛书中的错谬浅陋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学界方家和各界人士不吝批评赐教。

燕赵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9年1月

序

本书作者所讨论者，乃孕育于华北平原的一种民歌类别——燕赵小曲。同时，他又把时段限定在晚清这个“历史节点”，因为这是其“特别热衷的一个历史瞬间和空间”。如此，读者也就会像作者那样，于无意间徜徉于一个特定的自然、历史、文化景观之中，用多种维度来欣赏“燕赵小曲”的艺术魅力。

燕与赵，既是上古时代的两个方国之名，又是渊源甚久的一个地域文化之称；小曲，则是平原型文化区域极具代表性也最为成熟的民歌体裁。自古以来，富有活力的民间歌唱不断地从这块土地上吮吮乳汁以发展自己，又在相互的碰撞、交融之中养成并标示出燕赵文化独有的个性。

文化地理学家认为，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开启了燕赵文化史诗般的悲壮进程，并成为它“丰沛生命力的象征”。纵观往昔，“如果除开北京人、山顶洞人以及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不论，就有史以来的记述来看，恰恰是大禹治水成为了它文化上的重要开端。此后再到战国时期，最终奠定了它以‘燕赵悲歌’为标志的稳定特征。如果没有活跃的近于原始自然状态的生态环境，就不能产生出‘燕赵悲歌’的文化特征。”（张京华《燕赵文化》第1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此论确矣！“近于原始状态的文化生态”，激发了古代先民的悲壮行为，两者融合产生了慷慨的“燕赵悲歌”。本书著者正是从文化地理学的立场出发，对晚清以来的“燕赵小曲”加以多种视域的解释。然而，当年燕太子丹送荆轲于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复为羽声慷慨”（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的那首千古经典早已不复追寻。故本书作者未纠结于“何为悲歌”和“因何而悲歌”的诘问，而是将燕赵民歌置于更大的时空场域中，视“慷慨悲歌”为本地域文化独具的一种人文传统和艺术风骨，转而提出“燕赵善歌”的命题，这样的理论思路，既深深依托于历史，又紧紧关照现实；借地域文化的开阔视野，申论“小曲”之种种堂奥，因果相袭，溯源探流，将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区域音乐景观呈现于读者的

面前。

该书的讨论中心，仍然是我们熟悉的民间歌曲。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民歌研究始终是中国音乐学研究领域十分活跃而又成绩斐然的研究门类之一。在方法论的选择上，社会学的、音乐形态学的、民俗学的、语言学的、文化地理学的等等，皆有所见，且常出新论，形成了一个方兴未艾的民歌文化研究热潮。其中，借助文化学或文化地理学的理论、观念作民歌研究，更是以往民歌研究未曾有过的一种新探索。特别是运用文化区、文化景观及文化扩散理论所作的民歌研究，使这一领域别开生面。本书作者顺应这一学术潮流，立足于自己自幼就生活于其中的华北平原音乐文化区，选择该区域内最具代表性的“小曲”，以区域划分、曲目渊源、唱家风采、老调新词、文化重构等论题为重点而逐一展开论述。其理论方面的创新意义，必定能够对进一步探讨如东北、江南等平原型民歌区的文化风貌、音乐景观提供某些十分有益的经验。

每当论及中国民歌文化的历史传统时，我们都会为它虽然屡遭贬斥却仍然顽强不息的生命力量而感叹。这种力量从哪里来？人们自可以列举出很多原由加以论证。但真正的根源，我认为正在于它们各自所赖以生存的那些不同的自然人文环境。归纳成一句平常的话，就是华夏大地上“土地与土地间”的空间差异。不同的土地给不同的生物以不同的生存前提，它也同时给民间文化提供了不同的养分。因此，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仅在燕赵一地，就留下了《吕氏春秋》所记载的北音“燕燕于飞”、留下了《诗经》邶风、鄘风中的部分篇章，留下了荆轲《渡易水歌》，留下了汉乐府中的“燕代讴”、《燕歌行》《出自蓟北门行》、“邯郸河间歌诗”、《邯郸少年行》，以及清中叶《白雪遗音》中的直隶民歌和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河北民歌选》，让我们时时感受到燕赵民歌从未停息的踪迹和活力。同样，在中国民歌的地理版图中，也始终彰显着内蒙古草原民歌、新疆各民族民歌、北方秦晋民歌、中原民歌、滇黔民歌、巴蜀民歌、荆楚民歌、吴越民歌、客家民歌、闽台民歌、岭南民歌、西藏高原民歌和甘、宁、青高原民歌等区域民歌的不朽魅力。也正因为它们具备了各有渊源的生命活力和艺术魅力，它们才以上千年的积累建构成一个个风貌各异的音乐文化景观。如果说，历代文人学者已经在记录、整理、评品、研究民间歌曲也即把“口碑”变为书面遗产的业绩早已载入史册，并且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优秀学术传统的话，那么我

们更应该以他们为楷模，秉承“自己研究自己的文化”的学术自觉，像该书作者那样，关注我们所在的那块乡土上的民歌及各类民间音乐生态，深入考察，收集资料，为发现、总结每一个区域音乐景观的丰富蕴藏和文化特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同道胡小满，自河北师范大学毕业至今，二十余载间坚持教授中国民族音乐课，同时潜心于田野考察及民歌研究，足迹所至，遍及华北平原。每有所获，即吸收于课堂教学。在经年累月的体验感悟中，一种淳厚的平原文化气息，常常从作者的笔端流露出来。其行其言，总让我感佩不已！

乔建中

于杭州玉皇山麓思仁斋

2011年4月17日晚

引言 肇启于历史节点的思考

“小白菜，地里黄，三两岁上没了娘。跟着爹爹还好过，只怕爹爹娶后娘。”

“赵州桥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什么人留？什么人推车桥上走？什么人推车轧了一趟沟？”

“天津卫城西杨柳青，有一位美女白俊英，专学丹青会画画呀，这佳人哪十九冬，丈夫南学苦用功，眼睁睁来到四月当中……”

上述是在我国北方广为流传、妇孺皆知的燕赵民歌小曲——《小白菜》、《小放牛》、《画扇面》。有学者称其为代表燕赵民歌艺术的“名曲”。

有人说，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何为“悲歌”，因何而“悲歌”，姑且不论，至少说明燕赵自古善歌。的确，从太行的“东阳之地”到燕山南北，从漳河、滹沱河到永定河、滦河之“四河流域”，在广袤的燕赵大地上，民歌艺术自古盛行。可以说，燕赵人喜歌善唱，“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伴随着广大民众的劳动与生活，伴随着社会变革与时代进步，燕赵人创造、孕育出了多彩的抒表自己心声的民歌艺术。

小曲，也即现代人们常说的小调，因旋律委婉、声调优美、曲体短小、易学易唱而在浩瀚的中国民歌海洋中独领风骚。在中国民歌艺术苑中，它以“艺术形式较规整，结构的独立性和乐段的终止感很强，演唱时修饰润腔的手法很多，词曲配合和衬腔运用的方式也较多，语汇比较丰富”（江明惇，《汉族民歌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82年，第186页）而著称，有着鲜活的艺术表现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多样的艺术形式而活跃于广大民众的精神世界中。从文化学角度来看，小曲是一种音乐的艺术形式，更是一种大众文化。它在与民众的长期亲密接触中，热情地表现了民众的情感生活和多彩的世俗民风，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的话题。纵观其史，朱明以降，由于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的经济改革，至嘉靖、万历年间，农业、手工业有了很快的发展，生产力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受此影响，出现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和以雇佣劳

动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包括民歌小曲在内的市民文化和艺术形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至此，民歌艺术取代元曲而异军突起，它以情真意切、语言通俗、风格清新等特点，展示了明代社会无比广阔的生活画卷，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民歌小曲得到了越来越快的发展，为明清时期，尤其是晚清以来民歌艺术的兴盛奠定了良好基础。

燕赵善歌，历史悠远。明清之际，曲调委婉流利的小曲艺术在百姓中深入人心，小曲在燕赵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 and 影响也越来越重要，成为燕赵百姓选择民歌的最爱。

本书是一部从文化视野探讨中国区域性民间歌曲的著作，研究的内容是以“晚清”为题的燕赵小曲艺术。

燕赵是中国地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中极富魅力的文化区域之一。受燕赵文化的滋养，燕赵民众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燕赵乐舞艺术，尤其是元杂剧的兴盛，促进了明清以来民歌艺术的发展。明朝建立（1368年）后，特别是万历以来，产生并流传大量曲调优美、形式多样的小曲民歌，它们在唱叙民众情感、传递男女爱意、弘扬道德正义、记述社会生活等诸方面发挥了特有的艺术功用。当然，这些小曲在服务民众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各种艺术养分，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形态和特色，成为燕赵音乐的有机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国音乐文化的结构内涵。

众所周知，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此中国封建社会的“龙体”极不情愿地“病入膏肓”。此后又经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扰，至宣统三年（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就此“寿终正寝”。史家们大都将这一时期称为“晚清”。

“晚清”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是本书特别关注的一个历史瞬间和空间。此时，从远古走来的中国历史，在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制度文明之后，特别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在经过了二千多年的青春期、壮年期发展之后，至此由盛而衰，步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这是一个“历史英雄”的暮年。而此时的中国音乐艺术却东风应律、别有洞天：承蒙历代文化、艺术精气之涵养，在经历了金石之奏的雅乐时代、短箫铙歌的清乐时代、霓裳羽衣的燕乐时代、勾栏搭台唱戏的剧曲时代之

后，迎来了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这是一个以“南腔北调竞风流、小曲唱尽千般情”为标志的民间俗乐发展的新时代。特别是“孟姜女调”、“银纽丝调”、“叠断桥调”、“绣荷包调”、“杨柳青调”、“鲜花调”、“侗侗调”、“对花调”、“进秀兰房调”、“包楞调”、“八段锦调”、“凤阳歌调”、“拜年调”、“小白菜调”、“小放牛调”、“到春来调”、“铜钱歌调”等民歌小曲至此瓜熟蒂落，各种时调如雨后春笋般活跃于民众生活中，其鲜其美，令人目不暇接，成为庶民百姓人见人爱的艺术“新贵”。加之此时西乐东渐，以风琴、钢琴、管弦乐器与乐队、学堂乐歌与音乐教育、音乐厅与音乐会、《小诗谱》、《圣诗谱》与音乐书谱等内容为代表的西方音乐，在我们许多人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渐渐传入古老的华夏大地，深深地融入我们的音乐肌体之中，不断地丰富、改变与完善着我们的音乐质地和话语，使得我们有了更多的亲近、学习与品鉴音乐的“科学的方法”，从而也构成了中国晚清时期音乐文化发展的新特质与新内涵，这为本书研究提供了非常有趣的历史空间。因此，本书的研究自然倾慕于“晚清”这样一个历史的节点之上。

“晚清”之于现代中国社会的理论研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一方面，由于它紧系着中国社会的传统，有许多我们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和古老文化相聚于此，由此回溯，可以寻古探幽，去追寻往日的传统，那是古代中国的光荣；另一方面，它又紧连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变革与“转型”，体现着古老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楚楚阵痛和自豪。因而以此为题的学术研究，早已成为众多学者瞩目的历史时段，似有道不尽的话题，专著纷纷现世，颇具多彩之貌。然而依笔者愚见，研究者对“晚清”燕赵小曲民歌为题的关注，尤其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探究这一区域性音乐乐象的文化关怀，似乎还很鲜见。这使得笔者产生了在此方面“开疆拓土”之学术奢想。事实上，自明代以来，燕赵民歌的确发展得颇具成熟与姿色，且遗存丰厚，及至晚清已达高潮。这为笔者的学术奢望、学术冲动与理论探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可能。我们知道，由于人类所创造的“历史”始终处在动态之中，民歌艺术亦在不间断地变化中前行，对于其某一艺术乐象的观察、评判，往往需要借助于多个视点、视角，纳入一定的时间与空间来做整体的观察、探究，才有可能得出合乎客观规律的结论。故本书以“晚清”为题来研究燕赵小曲，虽起于“晚清”而不囿于此，当上启朱明以降、下迄今人生活的 21 世纪之初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时空之中。此间，有许多小曲的创腔

者、演唱者、赏用者都是“跨世纪”的人，他们亲历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与初来乍到的西方文化最初的现代的契合时光，也亲历了传统小曲的发展环境，熟悉社会生活，掌握了唱法唱技，积累了大量的感性认识。因此，我们将围绕着“晚清”这一历史节点，对此间民歌小曲做顾后、视中、瞻前的学理探讨，借此我们可以窥视到燕赵小曲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历程，得悉其特有的艺术规律，并愿借这样的规律为其未来的发展寻得几许宝贵经验。这必然牵扯到中国社会许多传统的、现代的文化、艺术与生活，涉及许多我们熟悉的或不熟悉的方方面面。因而，但凡此间与燕赵小曲艺术发展有关的各种显性的或隐性的艺术乐象与文化涵养（Cultural Nourish），都将是本书所感兴趣与关注的。

从技术层面来看，本书之所以选择“晚清”为题研究燕赵小曲艺术，尚有三个技术上的支点。

其一，此时期中国民歌艺术有了可资“视唱”的乐谱。众所周知，记谱法是人们借用符号、文字、数字或图表将音乐记录下来的方法，它所产生的记录即称乐谱。记谱法因国家、民族、时代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透过形形色色的记谱法，人们可以感受到其中所记录的各种音的绝对或相对高度、音的持续长度、音的强弱、音的装饰法、乐器的演奏方法及表情记号等音乐要素。我国自古即有记录打击乐器演奏的鼓谱，记录汉代诗歌演唱的声曲折，记录七弦琴音乐的文字谱，记录琵琶演奏的半字谱，记录宋代曲子的律吕谱……然而这些乐谱各有“专工”，并未呈现出大众使用的广泛性，也未将众多古老的民歌艺术记录在册。即使有所作为，也不甚精妙。在20世纪之前，除了《借云馆小唱》、《小慧集》中有少量以工尺谱形式记载的民歌旋律之外，绝大多数的中国传统民歌集堪称“诗集”，缺乏明显的音乐表象。时至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五线谱的逐步流传和使用，随着“谢韦记谱法”（简谱）的传入，中国音乐界增添了新的记录音乐的科学方法，大众也渐渐熟悉并接受了这些新的音乐记谱法。1904年沈心工编著的《学校唱歌集》是中国最早自编的简谱歌集，由此揭开了简谱入华的普及化进程。1919年以后，简谱逐渐成为人们记录民歌艺术的主要载体，以简谱记录的民歌选本增多，许多在老百姓口头流传的民歌曲调由此进入到纸质收录、传播与保存的新时代。例如，1926年上海新民书社编辑出版的《风琴小曲指南》（工尺谱与简谱对照）、1933年上海三民公司再版的《中国民歌集》（金世惠编）等都

是简谱版的民歌曲集，在标记音乐的节奏、节拍、调式、润腔等方面显现出更细致、精确之处。借助于现代印刷术与记谱法，古老的民歌小曲有了新的发展。“民间歌曲在清代保留了众多曲目，规模超出明代，许多文人也利用民歌小曲进行创作，……显示了民歌小曲在社会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史仲文主编《中国艺术史·音乐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13页）可以说，“由于记谱法的逐渐完善，加之年代较近，许多当时流行的民歌得以书面形式记载和保留下来，使我们有可能窥见河北民歌的概貌。”（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河北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歌集成·河北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5年，概述，第4页）这为我们研究“有音乐的音乐史”（杨荫浏语）——“有音乐的”民歌艺术发展史提供了可资视读的资料。它使燕赵小曲的研究，不再是望“文”（唱词）生义的“猜想”，而是一种以曲谱为据的“信史”时代。

其二，有了以唱片、磁带为标志的现代“音响”。1857年，爱尔兰籍物理学家L.斯科特制造了“声波振动器”，由此开启了“把音乐和人类各种声音保留起来的”新技术革命。唱片录音、磁带录音、光学录音直至数码录音，是自19世纪下叶至今人类社会经常使用的若干音响设备。在中国，从20世纪初的蜡筒、手摇唱机的快转唱片，到20世纪中叶使用电声技术的唱片与磁带，直至今日激光电声技术的信息存储盘，“记忆”音乐的设备不断与时俱进。运用这些设备和手段，我们保持并改善了音乐演唱演奏的艺术效果，也使得民歌小曲得以保存与传播。传播学告诉我们，传统的文化传播基本上属于在场交流。如果说，现代印刷术与记谱法的兴起完善了人们亲近音乐的方式，造就了大规模的音乐受众，使得乐谱的读者成为第一批超越听力的公众，摧毁了早期村落群体在场音乐信息交流的同步性，那么依靠录音设备与广播设备所特有的声音“记忆”与声音“叙述”，使得人人可以在不同场合聆听相同的声音，可以让现场缺席的传播对象，通过时空压缩的虚拟空间达到缺席中的“在场”效果，这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次质的突破。这种突破使民歌艺术由口耳相传进步到纸质承载后，再进步到借助于“电声”——借助于录音与播音、扬声器和音箱等电子设备对人的歌唱声音进行留存与还原的承载。其最大特点是，可以较为真实地记录、再现歌者的演唱——民歌的曲调、歌者的嗓音和嗓音中所蕴涵着的唱技与韵味。仅在中国音乐研究所藏《中国音乐音响目录》中就采录有燕赵地区的各种民歌作品约

848首，其中有近百位歌者及其嗓音、唱技与歌调得以保留。如今，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或因种种原因已现场缺席，但我们依然可借助于这些“电声”，真切地感触到其“在场”的“原汁原味”。这就为燕赵小曲研究提供了更近乎“逼真”的音响资料。在旧中国，有很多各种名目的唱片公司，如“百代”、“胜利”、“大中华”以及“高亭”、“长城”、“开明”、“昆仑”、“新月”等。在“20年代以后，开始出版大量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和民歌，如广东音乐、河北民歌、云南民歌等。”（陈钢、淳子、李黎著《玻璃电台——上海老歌留声》，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252页）

其三，有着与现代生活相似的物质环境。有人谈及中国历史进步的表象曾言，五百年前看北京，一百年前看上海。上海是“中国最现代最开放的大都市”。（高福进语）它自1843年11月正式开埠，至1900年人口已达100万，15年后超过200万，至1930年又超过300万，在远东居第二位（仅次于东京），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1947年时其人口再达500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由此至今，其始终保持中国最大城市的位置。上海自开埠以来，既有发达、繁荣的经济，又始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跑马场、交谊舞、电影院、留声机、咖啡馆、俱乐部、汽车、火车……是百余年来上海呈现给世人最显而易见的文化标志，并以此引领着全国物质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同样，在北方的北京，晚清的社会生活中也充满了“现代化”的冲动。“清末，开始出现大型商业市场，这是近代商业发展、变化的突出标志。”（李淑兰著《北京史稿》，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392页）当时的北京社会上有句顺口溜：“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其中提到的都是服装鞋帽业独占鳌头的店铺，其所售物品都是响当当的“名牌时装”。在饮食业中，又有全聚德、东兴隆、东来顺、谭家菜、仿膳等与穿着打扮相匹配的饭庄、菜馆。真正从“民以食为天”方面彰显出“现代化”的到来。这些天南地北的不同生活景象，不约而同地反映着同一个时代主题，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的历史阶段，”（赵德光著《阿诗玛文化重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这个阶段是“农民不断地转变为工人的过程，是从使用铁器不断地演变为使用机器的过程，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是从一个固定的地点走向广阔空间的过程。”（赵德光著《阿诗玛文化重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这里，我们看到的是，20世纪初与21世纪初，其

间时隔百年，都市愈来愈成为绝大多数人们理想的生活之处。最初的数层“高楼”被今天的几十层大厦所取代，手摇电话已被时下的手机所取代，最初的“老爷车”被今天的氢气汽车所取代……这些都体现着人类文明的飞快发展。但我们更愿意将这种进步视为社会现代化影响下各种生活要素的“更新换代”，其物质本质是相同的。当然，我们也深知其中有社会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差异。

文化本质，特别是物质文明本质的相同，使“晚清”以来活跃其间的民歌小曲，与今天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很相像、很亲近。特别是借助于曲谱、音响与“时代”上的“三贴近”，对于我们洞悉其间燕赵小曲及其艺术与文化有着许多观察、分析上的便利，赋予我们更多感触、感觉、认识和理解上的深刻性与时代性。因此，本书选择“晚清”以来的燕赵小曲做为研究对象，期待通过总结其百年兴衰巨变，探究其规律特质，寻找其发展良策妙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燕赵小曲之于中国音乐艺苑，即是一只“小雀”，借助于其艺术特质与发展演变之规律研究，来透视中国民歌、民间音乐的发展规律研究，乃本书之更大心愿。